

唐代小說選



唐 代 小 说 选

内 容 提 要

唐代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水平。叙写爱情，歌颂才侠，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发泄下层知识分子的牢骚，是本书所表现的几个主要方面；其中也有志怪说鬼的。鲜明的个性塑造，传神的细节描写，入微的心理刻画，动人的浪漫情调，是本书的艺术特色；也是有别于汉魏六朝小说的显著标志。鲁迅先生说，小说至唐，“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然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 代 小 说 选

徐士年 选注

责任编辑 许树棣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360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0册

统一书号 10219·12 定价 1.02元

略谈唐人小说的思想和艺术

代 序

唐人小说的数量很多。唐人自撰的小说专集就有许多种，还有许多单篇流行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一部分保存在宋初李昉等人编集的《太平广记》里。《太平广记》一共有五百卷，分八十八类，搜罗了宋初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以前的许多小说，其中就有不算太少的一部分是唐人作品。

唐人小说的作者，许多已经不可考了；就可以考知的来看，绝大多数都是中唐以后人。中唐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可以说是唐代小说特别兴旺的时代。

唐人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极其广泛。其中的成功之作，在艺术上是光辉夺目的。唐人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的是它所塑造的人物有鲜明的个性，有细腻传神的细节描写，有体察入微的心理刻画，同时也有动人心魄的浪漫情调，这一切使唐人小说在艺术上区别于过去的志怪小说。

为什么唐人小说会有这样的特色，又为什么唐人小说在中唐以后如此兴旺，这是值得我们探索的。

唐人小说继承了过去文学的遗产。这主要可以分三个方面：一是志怪小说的传统。这构成了唐人小说“尚不离于搜奇记逸”（鲁迅语）的特色和浪漫主义情调。二是骈文的传统。唐人小说文辞的华艳，声调的铿锵，以及许多写景、抒情的排偶句，都显然是从六朝以至唐初的骈文继承下来的。三是自《史记》以来的史传文的传统。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幽怪录、传奇等，……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所谓“史才”即是写史传文的才能。唐人小说许多都以“传”名篇，如《李娃传》、《霍小玉传》、《虬髯客传》……。唐人小说后面的那一段议论，也显然继承了《史记》“太史公曰”的论赞的形式。从《史记》以来的历史传记文学，为唐人小说提供了刻划人物、记述事件的范例。传记文学和小说的关系本来是比较近的，中国的小说就常常叫做“野史”。历史传记文学不是从唐代开始才给小说以影响，即使是六朝的志怪小说和记录名言隽语的笔记，也受了传记文学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笔”（散文）的传统。唐代小说作家有一些就是史家，如唐代最早的小说《古镜记》的作者王度，《枕中记》、《任氏传》的作者沈既济，就都当过纂修历史的官。《长恨传》的作者陈鸿也是一个历史家。他自己说：“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1〕，而

〔1〕《唐文粹》，卷九十五，陈鸿《大统纪序》。

且他也编过一部长达三十卷的历史著作《大统纪》。韩愈写过小说《毛颖传》之类，他也曾修过国史。这些都可以说明唐人小说和历史传记文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这一些都是唐人小说接受以前的文学遗产的迹象。唐人小说熔铸了这些遗产，把这些遗产的丰富营养，变成自己的艺术血肉。但这还不能构成唐人小说的新的艺术风貌。唐人小说的丰富多姿，主要也由于它植根于当时的生活。新的历史时代给唐人小说以新的生命。这可以分下面几点来说明：

第一，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繁荣富裕的时代，中唐以后，阶级矛盾固然更趋尖锐，但生产力的水平并没有因之下降。城市繁荣起来，繁复多样的城市生活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扩大了文学的主题。时代向文学提出了要求，必须走向人间，深入生活。唐人小说正是适应这样的要求而兴起的。

同时，基于城市的繁荣，广大的城市居民层开始形成起来。为了适应城市居民的娱乐要求，萌芽的市民文艺诞生了，产生了俗讲、市人小说和傀儡戏。这些新兴的富有生命力的民间文艺，为唐人小说提供了新鲜的素材和活泼的、富于感染力的表现方法。在文体的运用上，俗讲所用的自由活泼、韵散相间、接近人民口语的文体，对于唐人小说也有极大的影响。唐人小说许多都是一诗一文相辅而行，或在文中夹以诗歌，这显然是受了俗讲文体的韵散相杂的影响。唐人小说也有直接取材于当时民间讲说的故事的，像人所共知的白行简的《李娃传》，原是根据民间讲说的《一枝花话》改

写^[1]，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唐人小说受市民文艺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巨大的。市民文艺给了唐人小说以新的血液，这是形成唐人小说新的艺术特色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唐代是一个多民族大混合的时代，带有原始气息的某些少数民族的犷悍和梁、陈的文采风流相融合，这就必然多多少少冲破了山东士族和江左高门所矜尚的封建礼法，加之初唐以来推行科举制度的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六朝门阀的限制，引起了人们对个人才华和品德的重视；中唐以后更形成了崇尚“进士”的文采辞华而鄙薄明经的风气。这些都大大刺激了人们个性解放的要求。城市居民也是要求个性解放的，他们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他们反对门阀，反对种种封建的限制，虽然那种反对还很无力。

第三，唐人小说所以有这样高的艺术造诣，也和唐代的科举制度分不开。由于进士科是着重考试诗赋的，因之，应进士举的人的“行卷”^[2]，也必须以词华才藻来标榜自己，这决定了唐人小说文笔的华艳，“行卷”又必须能够引人入胜，

[1]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有云：“翰墨提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宋曾慥《类说》卷二十六有陈翰《异闻集》，其中《汧国夫人传》篇末注云：“旧名《一枝花》”。元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云：“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可以证明《李娃传》所叙述即唐时在民间流传的《一枝花话》的故事。

[2] 李商隐《与陶进士书》云：“文尚不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注云：“唐人应举者，卷轴所为诗文，投之卿大夫，谓之行卷。”行卷，即“温卷”所投之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

以便引起名人阅读的兴趣，因此，唐人小说都富于艺术的匠心，即使一个小故事也写得十分动人，人物形象也极其鲜明，这就具备了使人不忍释手的魔力，现在可以考知的唐人小说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进士，这一事实也可证明“温卷”的因素对于唐人小说所起的重大作用^{〔1〕}。

第四，唐代的古文运动和抒情诗的空前发达，对唐人小说也有很大的影响。小说这一种文学样式的成熟，必须在文学发达能够细致地描绘具体生活的时候才有可能（当然文学本身的发展又必然以社会生活向文学提出的要求为前提）。由于小说需要细致、生动、活泼的细节描写，因而小说是不适于用重重限制的骈文来写作的。唐代的古文运动给唐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唐人小说并不单纯是古文运动的产物，早期的唐人小说反是给了古文运动以影响的，而当古文运动兴起以后，古文这种文体又为小说提供了较之骈文更便利的工具，反过来又促成了小说的发达。唐人小说所以在中唐以后突飞猛进，和中唐以后古文运动的成熟是分不开的。

唐代抒情诗的鼎盛，也给了唐人小说以很大影响。唐人小说不但中间总要夹写几首诗，而且好些唐人小说是用写抒情诗的方法来写作的。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1〕 张长弓《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一书中云：“据冯沅君先生的统计，在四十八位作者中，二十七人的行事与出身未能考出；确知其曾举进士的凡十五人，举明经的一人，擢制科的一人，应进士试而落第的一人，可能是进士或制科出身的三人。由这个统计看来，传奇作者可以说是进士，或者举人，以及环绕在进士出身者左右的人。”

以上这些因素，交互错综地构成了唐人小说发达起来的历史基础。由于唐人小说是在包含着这样多的新因素的生活土壤上成长的，于是它就能有和过去文学不同的新的思想特征和艺术风貌。

二

唐人小说的主题，主要的是写恋爱、游侠，歌颂有才能的人，暴露黑暗的封建统治，发泄埋没在下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得志的牢骚，也有一些专门志怪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尽管也有消极的东西，如因果报应观念等等，但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那些作品，却太都有着比较突出的人民性和夺目的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光辉。

我们先从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谈起。唐人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大胆地追求爱情，并且忠实于自己的爱情的勇敢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形象表现了婚姻自主这一民主思想的萌芽，并且狠狠地鞭挞了当时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匍匐于这种婚姻制度淫威下的卑劣的负心汉。

唐代的婚姻制度是典型的封建主义的。唐代的门阀观念虽然不像南北朝时代那样严格、狭隘，但在统治阶级和平民之间的阶级界限仍是不可逾越的。唐制：“凡官户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媾偶”〔1〕。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如果和平

〔1〕《唐六典》卷十九。

民通婚是要治罪的^[1]。当然妾媵不在此限。

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婚姻，则不但由父母作主，而且以门第的高下作为婚姻的唯一标准。唐代政治虽然容纳了一部分中小地主参加政权，但士族集团包括新兴士族和南北朝遗留下来的旧士族，仍在政治上保持相当大的力量，再加上魏晋以来长期的门阀观念的影响，就使得唐代社会的一般心理都崇尚士族高门，当上高门的女婿是一件被公认为体面的事情。至于士族出身的人，那当然更非要“门当户对”的小姐不可了。

这种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里是有典型意义的。“门当户对”正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唐人小说中所写的恋爱悲剧，大都是受这种婚姻制度迫害的结果，而爱情的喜剧则是对这种婚姻制度进行反抗的胜利。在这一类作品里，蒋防的《霍小玉传》是一篇杰作。

霍小玉是一个在当时婚姻制度下惨厉地牺牲的少女。

霍小玉对爱情的态度是为人民所称赞的，霍小玉的死获得了千余年来读者的同情和惋惜，而李十郎几乎成了一切薄幸的负心人的共同名字。

蒋防在自己的作品里把封建婚姻制度和人们幸福的爱情生活对立起来，揭示出这种残酷的制度摧残了真正的爱情，戕害了霍小玉的生命，而驯顺地当这个制度的顺民的李益，也终身没有得到幸福的爱情生活。这样的处理，显示了作者

[1] 参看《新唐书》卷一八一《李绅传》。

的现实主义的深度。

白行简的《李娃传》，写一个妓女李娃和常州刺史荥阳郑氏的公子恋爱的故事。

这篇小说是以喜剧的形式作结局的，在唐代的婚姻制度下作出这种结局似乎是不现实的，但这里表现了一种对婚姻自主的愿望，表现人民对于门第限制的蔑视。这一作品使我们感到一种刚健的气息，这是和唐人其他恋爱小说中的女主角的多愁善感、哀婉可怜迥然不同的。这也许和李娃这个形象本来是民间的创造不无关系。

此外，唐人小说里还有不少卓越的女性形象，《莺莺传》里的莺莺，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光辉的女性典型。再如皇甫枚的《飞烟传》里的步飞烟，陈玄祐《离魂记》里的情娘……这都是一些使人难忘的形象。

陈鸿的《长恨传》主题比较复杂。这篇作品一方面鞭挞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和贵妃的荒淫无道，但另一方面却又歌颂了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我们是憎恨唐明皇的无道的，但当我们读到他“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不能得”地思念杨玉环的时候，当我们读到杨玉环的魂灵在蓬莱仙境凝神地追忆七夕的盟誓的时候，皇帝和贵妃的“神圣”身分不为我们所关心了，我们只觉得他们是一对感情真挚的平常夫妇。他们死生相隔，于是各自发出了最深挚的不可移易的怀念，我们被感动了，我们不由也跟着作者赞美起这种深刻的恋情来。在这篇作品里，陈鸿是把爱情提得很高的，因此，对爱情的歌颂这一思想对读者的影响才超过了前

半数对皇帝和贵妃的鞭挞。陈鸿在篇尾也说了“怨尤物，室乱阶”的话，表示他和白居易的目的都在于暴露和劝惩，而读者也珍视这种暴露和鞭挞的意义，但从整个作品来看，主要的效果却不在劝惩，而在于赞美爱情。看起来，在陈鸿、白居易的思想上，似乎也不是没有矛盾，他们一面想把天宝之乱的责任归到一个女人头上，但另外，他们又不能不被这种真挚、深沉的爱情所感动，而后者对于他们的感染似乎更大一些。因此他们把作品的重点从前者移到了后者，他们以“长恨”名篇正是主要着眼于爱情的表示。为了夸张地渲染这种爱情，他们布置了一个天上的环境，使唐明皇和杨玉环在死生永隔的情形下来各抒其怀念之诚；天上的琼宫和唐明皇闲居南内的寂寞的晚年，冲淡了皇帝和贵妃的身分，但却有助于表现无穷无尽的离别的愁思。清代洪升的《长生殿》的主题的安排，显然是从这里受到启发的。我们可以说《长恨传》有着和《霍小玉传》等作品共同的赞美真诚的爱情的倾向，而杨玉环的形象，就其主要方面看来，也是一个可以和霍小玉相提并论的忠实于爱情的光辉的女性典型。

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是一篇主要写游侠的作品，但其中红拂的形象，却是唐人小说中一个突出的女性形象。红拂不仅有远远超过杨素的善识英雄的慧眼，因而大胆地选中了李靖并决定了自己的婚姻，而且还敢于冒着大不韪私奔李靖。在她的眼中，大司空杨素是“尸居余气”，而封建婚姻制度，在她面前则完全失去了威力。红拂是具叛逆性的，无怪乎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头，要把她归入作为贾宝玉的前

驱的一系列古人之中了^[1]。通过红拂这个形象，《虬髯客传》不仅宣传了婚姻自主的想法，而且歌颂了红拂的叛逆性格和行为，这在当时是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的。

这一系列女性形象都共同追求着合理的爱情生活，她们对生活的美妙的梦想和历代人民要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是相通的，在这些形象里，我们感觉到青春的脉搏的跳动。

在这些正面写爱情的作品之外，李公佐的不满六百字的短篇《庐江冯媪传》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李公佐在这篇作品里没有写什么曲折的故事，他仅止写了一个女鬼因为她的丈夫在阳间续娶，因而和她同在阴间的翁姑就逼她把“簪宫刀尺，祭祀旧物”，总之是一切应该归主妇执掌的东西交出来，但她哭泣着不忍交出。故事就是写了这样一个场面，但写得很凄婉感人。在这篇作品里，有几点是值得提出来的：第一，这篇作品对不平等的封建婚姻制度表示了不满，丈夫已经续娶了，可是妻子的鬼魂却反要因此而受翁姑的逼迫和责骂，这不能不使读者为这个女鬼感到不平，而这不平实际上正是对封建婚姻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而发的。第二，如果说在《霍小玉传》、《离魂记》、《飞烟传》里，人的灵魂似乎比躯体自由，灵魂的世界似乎比人间公道些，可以少受一点封建礼教的拘束，那末《庐江冯媪传》就写了妇女在死后也逃不出封建制度的压迫。这种写法虽然是一种幻想形式，但却表现了封建社会对妇女压迫的深刻性，表现了封建婚姻

[1] 参看《红楼梦》第二回。

制度的顽强。这很容易令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祝福》里柳妈对祥林嫂说的那一段叫人毛骨悚然的话。

李公佐在这里朦胧地透露了他对封建婚姻制度中男女不平等地位的不满，而把深厚的同情寄托在女子这一方面。从男女不平等这一个方面来鞭挞封建婚姻制度，而且表现得比较突出，这是唐人小说中有数的一篇。这种新的对妇女的看法，尽管还是萌芽状态的，但确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所有这些写爱情的著名作品，在主要倾向上都是和封建制度不协调的，应该说多少反映了萌芽的城市居民的生活理想。但是，所有这一些爱情故事，作为爱情的基础的，都是男子和女子共同的诗才和美貌，而还不是性格的相投。恋爱的方式主要的还是一见钟情。比较美满的结局，也只是“夫荣妻贵”（如《李娃传》）。这些爱情都还是才子佳人式的，这是唐人小说和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的属于市民的爱情作品有所不同的一点。唐人小说所表现的恋爱观，基本上是属于当时下层的知识阶层——寒士的。寒士大都出身寒微，他们和人民群众比较接近，因而在他们的观点里，就有可能反映出人民的某些意愿（其中也包括了萌芽的城市居民的生活理想）。

唐人的爱情小说，所以能够万古长青，除了它的迷人的艺术魅力之外，这种和“毫无顾忌的被压迫阶级”（恩格斯语）相共通的进步倾向，应当是一个主要原因。

唐人小说里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主题是游侠。

游侠的主题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有其传统的。司马迁在《史

记》里就以专门的篇章来歌颂“以武犯禁”，“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侠士。这种打抱不平的侠士的形象，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一直为人民所向往。

唐代游侠思想非常盛行。唐代社会自然和一切封建历史时代一样，有很多不公平的暗无天日的现象，但由于城市居民层的形成和其他因素，唐代社会的生活风尚却崇尚个性解放，憧憬着未来的光明。这种昂扬的生活气氛和封建制度是不调和的，于是在生活的激流和封建制度的礁石相冲击的时候，就激发出了游侠思想的浪花。在唐代，复仇、结客、为人鸣不平，即杜甫所谓“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1〕的行为，是为人所称道的。李白歌唱过“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的侠义行为，认为只有这样才算“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2〕；他自己也曾挥金结客，在扬州“不逾一年，散金五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3〕。只有了解了这样的社会风气，我们才会明了唐代游侠小说的社会基础。

唐人小说里的侠士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是复仇，而且是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去复仇。《谢小娥传》里的谢小娥是一个弱女子，她的父亲和丈夫都被强盗杀了，于是她以毕生的精力尽瘁于复这不共戴天之仇。她乔妆改扮，备经艰苦，

〔1〕杜甫《遣怀》。

〔2〕均见李白《侠客行》。

〔3〕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当了仇人的佣仆，终于达到了手刃仇人的目的。她可以说具备了“立意较然，不欺其志”〔1〕的侠士品质。李公佐为她作传，也就是为了表彰她这种“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的志节。

《柳毅传》里的钱塘君的形象，是揉合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于龙的观念和钱塘江的怒潮的情景，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浪漫主义形象；但在实质上，作者却赋予了这位龙神以侠义的品质。

复仇思想是建立在个人恩怨的狭隘基础上的，在今天看起来没有积极意义；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民灾难重重，无处申诉，愈是无处发泄的怨愤就愈容易产生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的报复情绪，于是复仇的形象就博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与赞叹。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复仇的对象往往是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者，因而一些正义的、复仇的形象就有一定的人民性。

如果说谢小娥和钱塘君的形象还只表现了自己复仇的思想，那末柳毅、古洪、许俊、吴保安的形象，就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这些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基于高贵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为别人的不平，而付出了自己艰苦的努力以至于生命。

这些形象的共同的特征，是他们的强烈的正义感和坚毅的意志，其所以震撼人心，也正在于这一点。

〔1〕《史记·刺客列传》。

袁郊《红线》里的红线的形象，有更大的意义。红线出现在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的时代，在这样的局面下，人们把侠士的作用更扩大了，红线已经不止是一个为己复仇或为人打抱不平的侠客，她的入危邦、盗金盒是为了“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这个目的比之一切个人遭遇都重大得多。红线这个形象正表现了在战乱下的人民渴求太平的思想。袁郊把这样高洁的品行和超人的本领赋予一个少女，而且是一个婢女，这在一般歌颂侠义的思想之外，还表现了尊重妇女和奴婢的进步倾向，这应该看作是新兴的市民思想的影响，是值得提出来的。

在唐人小说的写游侠的作品中，《虬髯客传》里的虬髯客是一个写得非常成功，但却比较复杂形象。虬髯客给人的最主要的印象还是一个慷慨仗义的侠士，正是根据这个感觉，后人才称虬髯、李靖、红拂为“风尘三侠”。

我们看，虬髯客和李靖、红拂初一结交的时候，就忽然拿出了仇人的心肝，并且“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而这个仇人，却是“天下负心者”。“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式的结交，对品行卑劣的“负心人”的极端憎恶和鄙视，都是侠士性格的特色，虬髯客将家财赠予李靖的慷慨，也使我们想起唐代散财结客的风气。这些特征都使虬髯客成为一个侠士的典型。然而虬髯客的复杂，在于他还有逐鹿中原，想当皇帝的野心。作者对作为一个政治野心家的虬髯客也曾作过一些刻划，如作者在后半段写虬髯客在家里接见李靖、红拂时，“纱帽褐裘而来，亦有龙虎之状”，而